

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窑业的时空特征

王轶凌¹ 郑建明²

(1.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杭州 310007;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隋唐时期是浙江窑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以越窑为主,包括婺州窑、德清窑、瓯窑等窑口。从区域分布上,这些窑口大致可以划分成沿海与内陆两大类型:沿海型主要包括越窑与瓯窑,沿海岸线布局,生产规模庞大、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制瓷水平,广泛见于国内外的遗址、墓葬与沉船中,远及东非;内陆型主要包括婺州窑与德清窑,生产规模较小,产品质量一般,种类较少,区域特征明显,多售卖到当地,区域外极少见。水运在窑业的繁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受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强烈制约的制瓷业,其兴衰与海外贸易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大量的对外输出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制瓷业的迅速发展,从而迎来以越窑为代表沿海型窑业的繁盛。因此,不同的资源与运输条件,由此形成不同生产对象,并造就了浙江隋唐时期窑业的内外两个根本性格局。

关键词:浙江地区 隋唐窑业 沿海型 内陆型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主要产区,制瓷历史悠久,古窑址遗存丰富,整个主流发展过程可以划分成四个大的阶段:先秦时期的原始青瓷、汉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青瓷、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宋元明时期的龙泉窑青瓷。这四个主要发展过程中,越窑占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分别集中在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与慈溪的上林湖地区。东汉曹娥江流域成熟青瓷的创烧造就了汉—六朝时期浙江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到了唐代,作为生产中心的上林湖区域,窑场数量剧增、生产规模庞大、产品质量高超,特别是唐代晚期成功烧制的秘色瓷,不仅是宫廷用瓷的重要来源,也为当时的上流社会所珍爱,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唐宋时期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在9~11世纪,越窑产品大量行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文化对外影响、交流的重要载体。因此,隋唐时期是浙江窑业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

一 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窑口

浙江隋唐时期的制瓷业,无疑是以越窑为中心,同时也包括婺州窑、德清窑、瓯窑等窑口,这一格局在东汉时期即已成型,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越窑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对越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与研究,这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努力与探索,在浙江境内迄今为止已发现越窑窑址数百处。唐代是越窑生产的大发展时期,从隋至初唐一直到晚唐,无论是窑场规模,还是产品质量,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封三:1)。

瓯窑始烧于东汉晚期,历经六朝而盛于晚唐至宋初,北宋晚期渐衰;分布于温州地区的瓯江下游、楠溪江下游、飞云江下游以及台州地区的椒江流域;产品胎色灰白,釉色淡青,器物种类丰富,制作精良(封三:2)。根据考古调查发现,唐代

收稿日期 2014-12-29

作者简介 王轶凌(1981-),女,浙江省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古陶瓷研究。

郑建明(1971-),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陶瓷考古。

温州地区瓷窑址有13处^[1],2005年对永嘉龙下青瓷窑址进行过发掘^[2]。

婺州窑之名因唐代陆羽《茶经》而著名,故浙西地区瓷业遗存以“婺州窑”为名。婺州窑始烧于汉末,三国以后逐渐兴盛,隋唐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宋元时期丰富多样,元以后衰落。根据历年来的调查,浙西地区有窑址200多处,其中唐代窑址12处^[3],集中分布于金华、东阳、衢州、江山、龙游等地。唐代婺州窑以生产茶碗闻名,另外以大块褐斑做装饰的青瓷瓶(封三:3)以及乳浊釉瓷器,更突出了婺州窑的个性。

德清窑创烧于东汉晚期,持续至隋唐时期,主要分布于东苕溪中下游地区德清、余杭、湖州南部等地的青瓷与黑瓷同窑合烧的窑场^[4]。目前发现隋唐德清窑窑址14处^[5],唐代湖州古窑址3处^[6]。1999、2009年,考古人员对德清乾山隋唐窑址进行了发掘,除出土大量德清窑产品标本外,还清理出了完整的窑炉遗迹^[7];2000年,对宅前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唐代龙窑5条,出土了大批青瓷、黑瓷和褐彩瓷器,把德清窑的烧造年代下限延长至唐代中晚期^[8];2014年又发掘了窑墩窑址(封三:4)。

二 隋唐时期浙江窑业的时间特征

上述四个窑口在隋唐时期的生产状况可依据目前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等进行简单分期,基本情况如下。

1. 隋至唐早期

这一时期的越窑处于制瓷业生产的低谷阶段,窑址数量较少,以唐宋时期越窑中心产区慈溪上林湖为例,发现的120多处窑址中,这期的仅有13处^[9]。特别是隋代越窑窑址,单独的窑场至今没有发现,我们只能通过墓葬出土品加以认识,如新昌元家山隋仁寿四年(604年)墓出土的盘口壶、嵊州城关镇隋大业二年(606年)墓出土的碗和盘口壶,它们都是隋代越窑的代表性作品^[10]。隋至唐早期,产品以日常生活器为主,有碗、盏、钵、鸡首壶、盘口壶、罐等,器型总体较为瘦高。胎质较粗,多呈深灰、土黄色。釉层较薄,釉色为青黄或青灰。装饰单调,基本为素面,少量器见有褐彩装饰。装烧方法仍采用明火裸烧,窑具仅有少量的支烧具与间隔具(封三:5)。

地处金衢盆地的婺州窑,这一时期产品风格与越窑接近,器型简单,大部分器物造型与越窑类同,亦有部分鸡首壶、罍(封三:6)^[11]不见于越窑同类器,独具地域特色。胎质较粗,胎色有灰

白、深灰等。产品以青釉为主,色泽较深,多呈青灰或青黄色,还有少量酱褐釉瓷。器物基本无纹,只有一定数量的褐彩装饰,呈斑块状或条带状。装烧方法均为明火裸烧,碗类器使用多件叠烧,内外底留有泥点垫烧痕。

位于东苕溪流域的德清窑,这一时期窑址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器型较单一,以碗为主,另有少量盘、碟、罐、盆、执壶、鸡首壶、盘口壶、多足碗等。产品质量较东晋南朝时下降,制作粗糙。产品有青釉与黑釉两种,以青釉为主,器物不再施化妆土,多呈豆青色,黑釉器多为酱黄色,仅施半釉,下腹及底无釉。胎质粗疏,胎色呈土黄、紫红、青灰等。装饰基本为素面,仅少量青釉饰有褐彩。窑具有支烧具与间隔具两种(封三:7)。

温州地区唐代早期的窑址目前尚未发现,因此面貌不太清楚。有学者提及,隋和唐代中早期的瓯窑胎质灰白,釉色青黄,釉易剥落^[12]。

从上述这一时期的窑业状况可以看出,烧成技术没有大的改变,装烧方法均为明火裸烧,从烧造的产品类型来看,大都为前期产品种类的延续。

2.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的越窑,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开始使用匣钵装烧,产品质量已处于上升时期。窑场的生产区域主要分布于上林湖地区,产品以碗、盘类为主,平底与饼形底器物基本不见,出现宽圈足与玉璧底器物。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许多器物外腹施釉不及底,但施半釉现象已消失,釉层匀净,釉色有青绿、青黄和青灰。装饰上与唐代早期相似,多为素面,少量使用印花、划花和堆塑贴花。装烧方法以直接叠烧为主,器物之间有小的泥点间隔(图一)。这是浙江隋唐窑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特别是匣钵出现,是一种制瓷技术上的革新,为进一步提高瓷器的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上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的婺州窑和德清窑均与唐代早期的情况基本一致,瓯窑缺乏考古资料,故面貌不太清楚。

3. 中晚唐时期

随着饮茶之风盛行、宫廷的需求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整个浙江瓷业的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跨入了繁盛阶段。越窑窑址分布广泛,窑场规模宏大,以上林湖地区最为集中,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胎质细腻坚致,胎色青灰。器物满釉为多,匀净滋润,釉色呈青绿、青黄等(封三:8)。装



图一// 盛唐时期上林湖采集越窑青瓷标本

饰多为素面,另外印花、刻划花、镂空、贴塑、褐彩也有使用,还见有金银扣及镏钼工艺。装烧方法上,以匣钵装烧为主,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匣钵外封釉,这使密封功能得到强化,为成功烧制出精美绝伦的秘色瓷提供了工艺基础。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3件越窑青瓷^[13],其“衣物账”上明确将其称为“瓷秘色”,这类产品代表了当时越窑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龙窑长度一般在40多米,窑床坡度10多度,尾部坡度略小;火膛一般作半圆形,略低于窑床;窑床开有多个窑门,窑门呈八字形,门外有护坡^[14]。

中唐时期的婺州窑总体风格上区域性特征明显,胎色较深,露胎处呈紫红、土黄色等,表面粗糙,夹杂有较多的细砂粒。内外施釉,外腹一般不及底,产品仍以青釉为主,亦有少量酱褐色釉。装饰基本为素面,沿用褐彩,但手法上有所变化,从早期的杂乱多演变成少量的块斑状对称装饰(图二)。这时新出现了乳浊釉瓷,从龙游、衢州等

地窑址采集的标本来看^[15],产品釉色以月白为主,釉层比同时期青瓷稍厚。晚唐时期产品与越窑较为相似,玉璧底碗、宽矮圈足碗、花口窄圈足碗、瓜棱式执壶等,都为越窑常见器类。胎质较前期略细,胎色较浅,多为浅灰色。青釉产品外腹施釉不及底。装饰基本为素面,沿用对称规则的斑块装饰。总的来说,唐代婺州窑的主要产品特征和瓷业生产技术特征与越窑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性,如婺州窑中较为常见的黑釉与酱色釉,在越窑中比较少见,而部分窑场乳浊釉产品的烧造,这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中唐时期的德清窑迅速走向衰落,窑址数量不多,产品种类少,以碗为主,底多为饼形底,部分底心以细阴线刻划一圈,可以看成是玉璧底足的一种简化形式。胎色较深,呈青灰或灰黑色,质地粗松。釉色以青釉为主,大多施釉不及底,亦有少量酱褐色釉。器物基本为素面,少量有褐斑装饰。装烧方式均为明火裸烧,碗类器多件叠烧



图二// 中唐时期婺州窑器物

1.婺州窑青瓷褐彩盘口壶 2.婺州窑双系褐斑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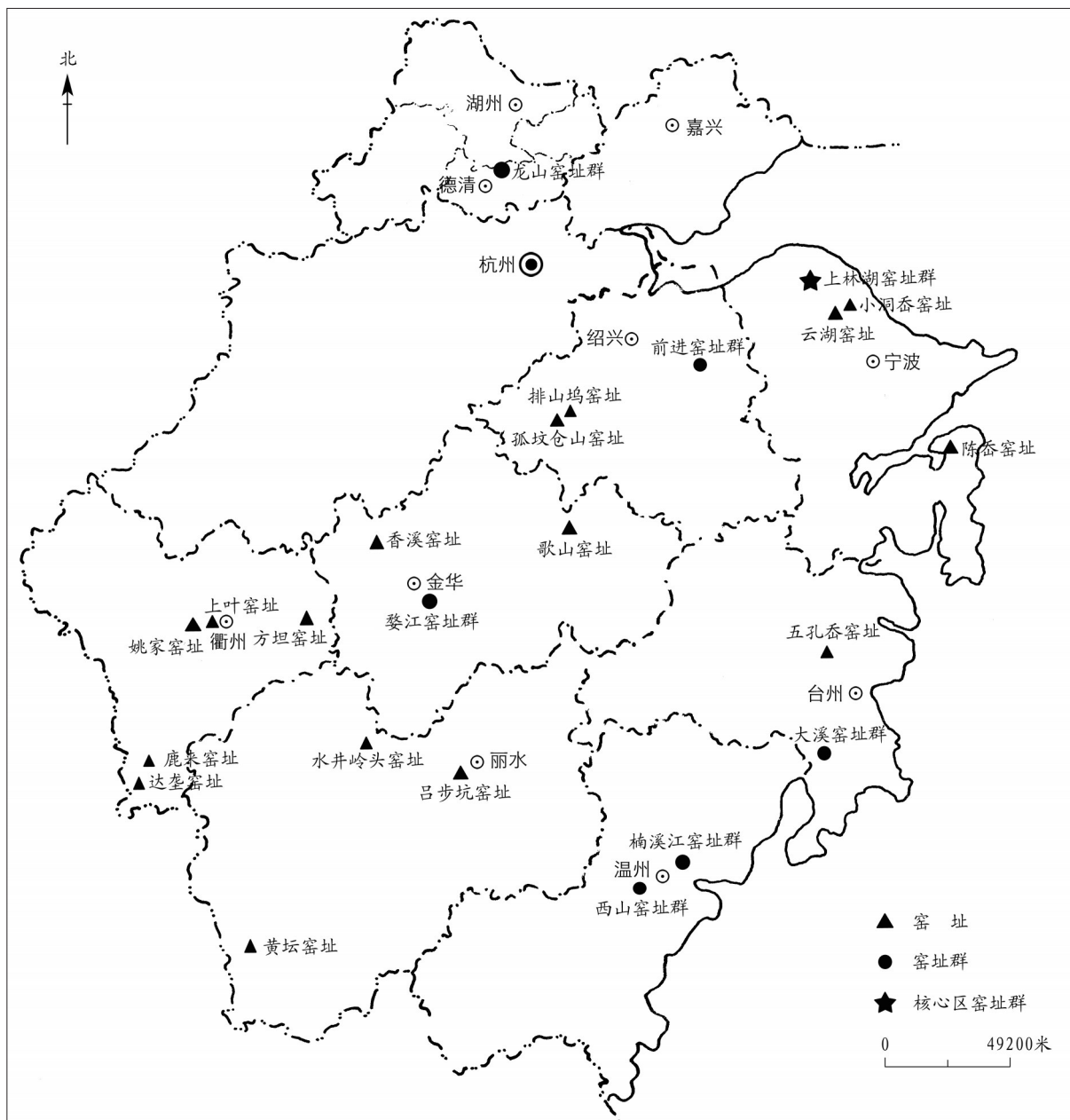
图三// 唐代中晚期德清窑器物

1.德清窑敞口碗 2.德清窑执壶

(图三)。德清窑黑釉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显赫,东晋南朝为德清窑的鼎盛时期,产品色黑如漆,盛极一时,还曾远销朝鲜半岛^[16]。隋唐时期虽然黑釉瓷继续烧造,但多为粗制产品,并未将其发扬光大,如德清出土有一件唐元和三年(808年)黑瓷粮罍^[17],这应该是德清窑的晚期作品,此

后的晚唐时期德清窑逐渐走向停烧。

唐代中晚期是瓯窑发展的一大高峰,器物种类繁多,造型匀称,胎体轻薄。以永嘉龙下窑址为例,胎质细腻致密,胎色较淡,呈灰白色。釉色以青釉为主,玻质感强。装饰以素面为主,少量刻划纹和褐斑装饰。装烧方法有明火叠烧和匣钵装烧



内陆型:龙山窑址群、前进窑址群、婺江窑址群、排山坞窑址、孤坟仓山窑址、歌山窑址、香溪窑址、上叶窑址、姚家窑址、方坦窑址、鹿来窑址、达垄窑址、黄坛窑址、水井岭头窑址、吕步坑窑址;

沿海型:上林湖窑址群、大溪窑址群、楠溪江窑址群、西山窑址群、小洞岙窑址、云湖窑址、陈岙窑址、五孔岙窑址。

图四// 隋唐时期浙江地区主要窑址分布图。

两种,匣钵数量不多,基本为陶质,还出土少量小碟状支垫具。龙下窑址产品在器型、装饰风格上与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基本相同。唐代瓯窑与越窑的不同之处在于胎色略浅,釉色亦更淡。凸显瓯窑地域特色的是其褐彩装饰,这一工艺是在继承东晋、南朝釉下点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唐代后期有所创新,除褐斑与条带纹外,还出现了写意的植物类纹样。

中晚唐时期是浙江隋唐窑业发展的高峰期,不同地区的瓷窑产品呈现出区别明显的风格,随着窑炉的改进,匣钵装烧技术的普及,为迎合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习俗,创新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器物类型。

三 隋唐时期浙江窑业的空间特征

通过对这四个窑口所生产的产品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又恰好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合,即沿海型与内陆型。沿海型主要包括慈溪、宁波、台州以及温州等地区;内陆型则包括沿海以西的整个浙江地区,有浙江中西部的金华与衢州地区、浙江北部的德清地区(图四)。

沿海型窑址以慈溪上林湖为代表,上林湖及其周围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的瓷窑遗址是唐宋越窑的典型遗存和中心产区,发现有古窑址近200处。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受到饮茶习俗的推动以及海外贸易的刺激,越窑生产迅速发展,除大量生产普通日用瓷器外,还设有烧造贡瓷的贡窑。上林湖出土的光启三年(887年)越窑青瓷墓志罐(封三:9)上就有“贡窑”二字,是唐代上林湖“置官监窑”烧造宫廷用瓷的最可靠依据。唐代,越窑青瓷的釉有“类玉、类冰”,“千峰翠色”之谓,它们指的是越窑上品的釉色,这类制作精美、釉色纯正的器物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秘色瓷”,产品质量冠绝当世。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自中唐以来已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自身巨大的市场开拓力使其将市场扩展至海外区域。唐代中晚期,商贸航运已十分发达,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中国与南海各国以及西亚、中东乃至非洲交往的主要路线^[18],此时的越窑声名远播,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随着贸易商船,远销海外。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为数甚多的越窑青瓷,如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年代为

826年前后的黑石号沉船出水有约250件越窑青瓷,有海棠杯、细线划花方盘、执壶、渣斗、穿带瓶、熏炉等精美产品^[19];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新罗地区的庆州拜里、锦江南岸扶余、古百济地区的益山弥勒寺、雁鸭池等都出土有很多唐代越窑青瓷器^[20];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以福冈市鸿胪馆遗址和京都地区的考古发掘为例,在发掘出土的早期中国陶瓷中以9世纪后期的越窑青瓷最多^[21];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均发现有许多唐代的越窑制品^[22];另外,斯里兰卡、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肯尼亚、埃及福斯塔特古城遗址都有大量的唐代越瓷出土^[23]。宁波地处东南沿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古称明州,在唐宋时期是朝廷对外开放的通商大埠,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留下了很多文化遗存,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和义路码头遗址、市舶司遗址等都出土有大量的越窑青瓷,唐子城遗址出土有波斯陶器,这些都印证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曾经的辉煌。慈溪上林湖区域邻近于宁波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便捷的水运交通,成为这一时期越窑制瓷业的中心产地。

除慈溪上林湖外,宁波、台州、温州一带的产品无论在产品器类、工艺技法、成型技术、装烧方法等方面几乎与中心产区上林湖窑址群的基本一致,除温州等地区因胎土的原因在呈色上有所不同外,大部分地区的产品几乎类同。因此,沿海类型可以看成是越窑密集区域的一个扩大。在时间上,作为核心产地的上林湖出现相对较早,在盛唐时期开始上升,中晚唐进入鼎盛时期,也正是在中晚唐最兴盛时期,扩展到整个沿海地区。沿海型包括传统上所称的越窑核心区域与瓯窑区域,有学者在研究越窑对浙江其它窑口的影响时,即提出瓯窑是与越窑联系最密切的一个窑口,发展上几乎亦步亦趋^[24]。沿海类型窑业的繁荣发展与运输便利自然相关,但也与传统文化(即传统窑业)密切相关,内陆窑场不发达,与运输成本高也有直接关系,价廉质劣的窑业产品在普通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市场,因此其销售地主要是当地。

内陆型指的是传统上的婺州窑与德清窑,在地理区域上包括钱塘江以北的德清窑和钱塘江以南的婺州窑,它们兴盛的时间比较早,在隋至中唐时期即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窑址数量多,产

量大,但产品质量一般,胎质较粗,极少施满釉的器物,器类相对简单。产品除传统的青瓷外,尚有酱色釉、黑色釉等产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月白、玫瑰紫等乳浊釉的创烧,是以青瓷为特色的浙江地区极具特征的产品。到了中唐或中晚唐时期迅速衰落,婺州窑地区窑址数量减少,风格似乎亦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独具的特色有所弱化,许多特征明显有沿海型影响痕迹,而德清窑在公元800年前后进入停烧的行列。

金衢盆地处于浙江中西部,属半山区,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山脉、水系、植被、土矿资源、降水、气候等条件与面向海洋的浙东地区差别较大。婺州窑和德清窑地区由于当地瓷土原料成分的不同,胎质普遍较粗,为了掩盖自身的缺陷,都成熟运用了化妆土技术,化妆土可使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并使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覆盖,这样烧成后的釉面清亮、滋润,增加产品的美感。婺州窑的主流产品是青瓷,德清窑虽以黑釉瓷而出名,但各窑址的大宗产品仍为青釉。中唐以后,越窑迅速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越窑的规模 and 产品质量均超过了第一个高峰,迫使许多窑场包括德清窑停烧。婺州窑正是由于原料的原因,无法生产纯粹的“尚青”单色釉,为了求得发展,只能想尽办法生产其它品种的产品,在对窑业文化和制瓷技术的吸纳上兼容并蓄,乳浊釉瓷的创烧极具地方特色。

四 小结

对于受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强烈制约的制瓷业来说,窑业生产的兴衰成败都与周边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不言而喻。但除此之外,瓷器生产之后的下一个环节——贸易,其实也在承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影响。浙江隋唐时期的窑业,正是在地理环境的这种强烈作用下,划分成沿海型与内陆型两大类型。

内陆型相对远离海岸线,不易于航海运输,在地理环境封闭、无法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的地区,产品多售卖到当地,质量无法与要贩卖到境外的产品相提并论,目前国内外考古材料也基本证明了这一点,内陆型窑业的产品,较少在海外发现,而主要见于本地的墓葬与遗址中。由于内陆型的窑业主要供应本地市场,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对胎土等原料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使更多的地区具备生产的条件。该类型产品在向附近输出时由于较高昂的陆路运输成本,因此与周边地

区交流可能更多的是窑业上的向外辐射。而不

仅是产品的输出。因此内陆型窑业的分布区域相对比较广,除浙江中西部的婺州窑地区、北部的德清窑地区外,还远及浙江南部的松阳、庆元,福建北部的建阳,江西东部的景德镇、余干、玉山等地区,基本包括了浙闽赣三省相邻区域,其分布范围远较沿海型为大。

沿海型的窑业产品,广泛见于国内外的遗址、墓葬与沉船中,并且远及东非,如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黑石号沉船等。这些窑场的布局首先需要便利的水运条件,其分布所在地从上海经台州至温州的沿海航线,至少是汉代以来浙北通往温州的重要通道,即方便于往文化发达的浙东北及中原地区运输,同时这里亦是向海外输出的重要港口。因此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产品远销海外,这种贸易反过来也会促进当地制瓷业努力发展新技术、新工艺,使产品质量更进一步的提高。但由于此类产品的质量较高,且其呈色与本地的资源密切相关,远非仅靠制作技术即可,因此其分布区域相对集中于具有类似资源且交通便利的浙东、浙南的沿海地区。

因此,不同的资源与运输条件,由此形成不同生产对象,并造就了浙江隋唐时期窑业的内外两个根本性格局。

[1]温州市文物处编:《温州古代陶瓷研究》,西泠印社1999年,附表部分。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永嘉龙下唐代青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1期。

[3]依据浙江省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统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有删减。

[4][7]郑建明:《德清窑略论》,《文物》2011年第7期。

[5]朱建明:《隋唐德清窑窑址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6]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8]袁华:《德清古代窑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东方博物》第三十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9]谢纯龙:《隋唐早期上林湖越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10]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图版156、157、158、159。

[11]柴福有:《衢州古陶瓷探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12]金柏东:《瓯窑探略》,温州市文物处编《温州古代陶瓷

- 研究》，西泠印社1999年，第4页。
- [13]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 [14]郑建明：《唐宋时期越窑制瓷技术略论稿》，沈琼华主编《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对外传播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59-60页。
- [15]贡昌：《唐代乳浊釉瓷窑——龙游、衢州两处古窑址的调查》，《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 [16][韩]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 [17]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图版162。
- [18]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30页。
- [19]陈克伦：《黑石号出土的越窑瓷器与唐代越窑的外销》，沈琼华主编《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 [20][22]林士民：《试论越窑青瓷的外输》，《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38、350页。
- [21][23]秦大树、谷艳雪：《越窑的外销及相关问题》，沈琼华主编《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188页。
- [24]郑建明：《越窑之青及其对浙江其他窑口的影响——论浙江加彩瓷及其成因》，中国古陶瓷学会编《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责任编辑、校对：黄苑)

The Kilns Industry of the Zhejiang Area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NG Yi-ling¹ ZHENG Jian-ming²

(1.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Hangzhou, Zhejiang, 310007;

2.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Abstract: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itnessed a boom of the kilns industry in Zhejiang area with Yue kilns taking a majority. The other kilns developed at the time included Wuzhou kilns, Deqing kilns, and Ou Kiln. These kilns can be categorized as costal kilns and inland kilns. Costal kilns, most of them were Yue and Ou kilns, were distributed alongside the costal line and often with a large production scale. The products of the costal kilns were of a broad variety and high quality,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at the time. Costal kilns porcelains were widely discovered today in archaeological sites, burials, and shipwreck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far as to Eastern Africa. Inland kilns, mainly Wuzhou and Deqing kilns, were often of a modest scale and the products were with limited variety and quality. Porcelains produced in inland kilns carried a strong local style and were mainly sold locally. Very few of them have been found outside the production region. Marine transportation was crucial to the kilns industry. Oversea trad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rcelain production that was restrained by loc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Large porcelain exportation greatly stimulated the production, which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costal kilns. It is concluded that different resource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led to different porcelain produc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two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kilns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 Zhejiang area; Sui and Tang kilns industry; costal; in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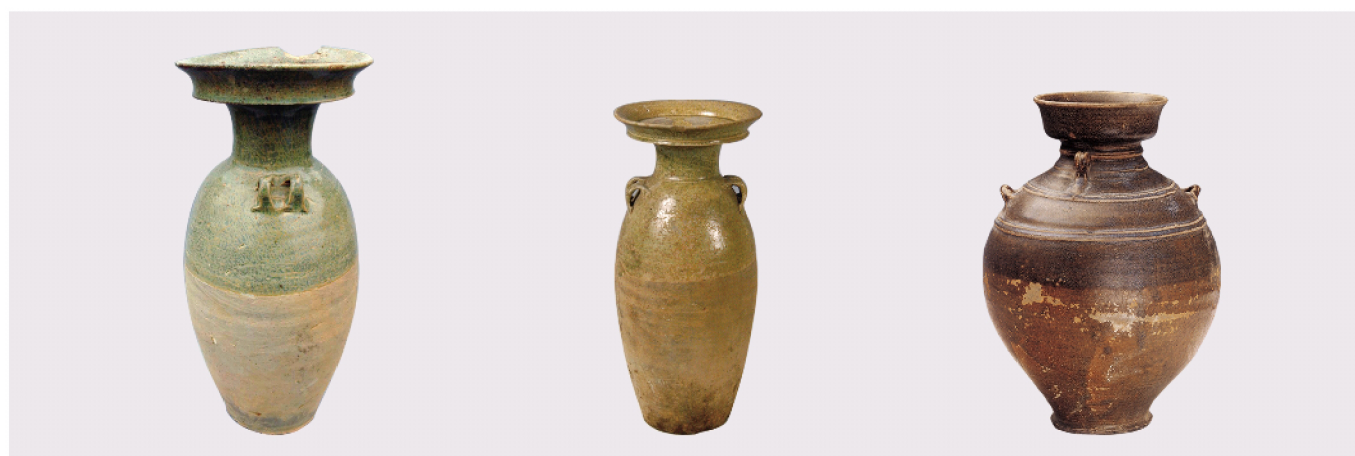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瓷器



1.越窑青瓷蟠龙罍

2.瓯窑褐斑唾壶

3.婺州窑褐斑瓶



4.德清窑青瓷盘口壶

5.越窑青瓷盘口壶

6.婺州窑四系罍



7.德清窑青瓷鸡首壶

8.越窑青瓷褐彩熏炉

9.越窑青瓷墓志罐

(注:1、2.唐代中晚期 3、8、9.唐代晚期 4-7.隋至唐代早期)

(文见第82页)